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理论文库

中国政党政治研究

1905—1949

李金河 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理论文库

中国政党政治研究

(1905—1949)

李金河 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政党政治研究(1905—1949)/李金河著.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9

ISBN 7-80211-294-X

I. 中...

II. 李...

III. 政党—研究—中国—1905~1949

IV. D6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086597号

中国政党政治研究(1905—1949)

出版发行: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北京西单西斜街36号(100032)

电 话:(010)66509360(总编室) (010)66509364(发行部)
(010)66509618(读者服务部)

网 址:<http://www.cctpbook.com>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金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字 数:400千字

印 张:24.75

版 次:2007年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定 价:48.00元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 首席顾问律师鲁哈达

前 言

对于刚刚跨入 20 世纪门槛的中国人来说，政党是个“洋物”。当时的人们会自然而然地将它与“朋党”、“会党”扯在一起，这种根深蒂固的传统意识对人们认识政党和政党政治产生了巨大阻力。因此，当我们考察政党活动时，千万不可忽视传统观念的影响。

由今而观，中国的政党和政党政治确有许多与众不同的地方。经过多年的探索，到上世纪初，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已经认识到，欲改变落后挨打、亡国灭种的危局，改革或改变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出路只有一条：像日本那样，学习西方，成为一个立宪国，而立宪与政党如鸟之双翼，缺一不可，故“非政党政治不可救中国”。可见，政党之进入中国，更多地是一种期望和向往，是将政党政治与立宪政治放在一起，当做救国良方引入的，而中国走向现代化，创建现代民族国家也是依靠现代政党的推动。

中国政党政治活动的主线是向西方学习，政党政治实践的主流是模仿外国模式。与欧美等西方国家政党生成的环境不同，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无论在政治力量还是在经济实力上，无论在人数还是在成熟度上，均处于极其脆弱的状态。年轻的资产阶级政党登上政治舞台后，在“反满”的旗号下，成功地进行社会动员，取得了辛亥革命的伟大胜利。

刚刚建立起来的中华民国生存环境太恶劣了，人们仅凭良好的愿望无法改变严酷的社会现实。孙中山及其所领导的同盟会虽然完成了推翻帝制的壮举，却无力建造一个如美利坚一样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

一个国家政党政治的形成，是由该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传统决定的。在中国这样一个多阶级、多阶层、多民族、多宗教信仰、封建意识浓厚、政治经济落后且又极不平衡的大国，究竟选择什么样的政党政治模式才能适合中国的国情呢？这是中国近代革命家们和先进知识分子都在极力探求的理论和

现实问题。实际上，中国人探索政党政治的历史是一部向西方学习的历史，更是一部探索中国式政党政治道路的历史。从学习模仿西方国家“建立合众政府”开始到孙中山“以俄为师”改组国民党，从国共两党合作到蒋介石建立一党独尊、排斥其他政党的专制体制，中国的政党政治在近半个世纪的发展过程中，先后经过了多党政治和一党专制，结果均告失败。

中国政党政治模式探索失败的历史昭示人们，无论是搬用西方政党政治的模式，还是逆世界潮流而行的封建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混合为特征的一党专制，只能把国家和民族引向灾难。历史也同样告知人们，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人，立足中国实际，经过长期的探索和实践，在掌握和驾驭中国政党政治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所建立的适合中国国情的一党领导、多党合作的现代政党政治体制，才是中国政党政治的正确抉择。

本书以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的产生到国民党“一党专制”独裁统治在大陆的失败为脉络，以民初政党政治的实践为主要内容，以不同政党政治模式的形成及失败缘由为研究重点，特别运用量化分析方法，对一直困扰着政党研究者们的难题——民初政党的数量进行了全新的考证，如能给有兴趣的研究者们以启迪和帮助，实是欣幸。

鉴于学者们对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形成已有清晰的阐述，故不将之作为本书的主要内容，仅在结束语中作了简单勾勒。

真诚祈望同行专家和读者朋友对于其中的不妥之处予以批评指正。

作者

2006年12月

目录

前 言	1
第一章 中国政党的产生及早期活动	1
第一节 政党思想的传播与政党组织的孕育	1
一、“师夷之长技”与中国资产阶级的产生	1
二、中西对比的反差与政治观念的更新	5
三、甲午战争的惨败与士人阶层的公开抗争	8
四、维新团体的发展及对政党理论的宣传	14
第二节 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的诞生	20
一、孙中山的早期革命活动与兴中会的建立	20
二、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和革命团体的竞起	27
三、中国同盟会的成立及其政纲	35
第三节 立宪运动的破产与不同政治角色的殊途同归	41
一、晚清“新政”与立宪运动	42
二、立宪团体的兴起与中国合法政党的呈现	45
三、国会请愿运动的失败与立宪运动的破产	52
四、不同政治角色的殊途同归	55
第二章 民初政党形态分析	59
第一节 政党标准的理论考察	59
一、政党的概念与基本特征	59

二、20 世纪初期政治家们对政党的阐释	65
三、政党与社团、会、利益集团的异同	70
第二节 民初政党的量化分析	72
一、民初政党涌现的社会政治环境	72
二、民初前后组党的四个阶段	76
三、民初政党的数量考辨	77
第三节 民初政党的政治主张	99
一、中国同盟会的政治主张	100
二、中华民国联合会的政治主张	101
三、共和党的政治主张	104
四、统一共和党的政治主张	107
五、国民协会的政治主张	108
六、共和建设讨论会的政治主张	110
七、中国社会党的政治主张	111
八、其他政党的政治主张	114
第四节 民初政党的经费来源	116
一、民国初期各政党经费的筹集	116
二、国民党的党费筹集	119
三、其他政党的经费问题	123
四、国民党党费改革与社会基础的扩大	126
第三章 民初政党政治的模仿与失败	128
第一节 民初政党的分化组合	128
一、宋教仁改组国民党	129
二、共和党的组成与统一党的复出	138
三、民主党的组建	141
第二节 各政党在政治舞台上的激烈争斗	146
一、同盟会与袁世凯的初次交锋：君主立宪还是民主共和	146
二、同盟会与袁世凯的第二次交锋：定都北京还是南京	149
三、同盟会与袁世凯的第三次交锋：责任内阁制还是总统制	150

四、国民党与袁世凯的第四次交锋：超然内阁还是政党内阁·····	156
五、国民党与袁世凯的第五次交锋：凯歌还是丧钟·····	168
第三节 民初政党政治的彻底破产·····	173
一、民初政党政治的穷途末路·····	173
二、多党政治模仿失败的原因分析·····	189
第四章 国会的重现与政党的蜕变·····	209
第一节 国会的重现与无形政党的粉墨登场·····	209
一、护国战争中的反袁大联合·····	209
二、国会的重现·····	214
三、无形政党的粉墨登场·····	219
第二节 各种社会思潮的激荡与政党的重现·····	227
一、各种社会思潮的激荡·····	227
二、民族资产阶级的发展·····	235
三、资产阶级政党的重现·····	241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254
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254
二、工人阶级的成长与工人运动的发展·····	258
三、共产国际的帮助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261
第五章 国民党一党专制体制的破产·····	267
第一节 孙中山政党政治道路的新探索·····	267
一、国民党的重建和孙中山革命道路的转变·····	267
二、国民党一大的召开和三大政策的形成·····	271
三、孙中山“以党治国”思想的形成·····	276
第二节 国民党新右派对“以党治国”思想的阐释·····	286
一、国民党的分裂·····	287
二、“戴季陶主义”的出笼·····	291
三、国民党新右派对孙中山“以党治国”思想的阐释·····	294
第三节 国民党一党专制体制的破产·····	304
一、国民党“一党治国”体制的建立·····	304

二、从“一党治国”到“以蒋治国”	312
三、国民党一党专制体制失败的原因分析	322
结束语 中国政党政治模式的历史探索	332
一、资产阶级多党竞争模式的昙花一现	332
二、国共两党合作模式的最终破裂	335
三、国民党一党专政模式的破产	338
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模式的诞生	339
附 录 民初政党主要代表人物评述	342
主要参考资料	386
后 记	388

第一章 中国政党的产生及早期活动

政党是近代政治的产物，是政治文明发展的必然结果。世界政党产生的模式一般可分为原生型模式和次生型模式。原生型模式即政党的产生是本国内部条件造成的结果。这些国家的政党大多在体制内产生，先有国家而后有政党。所谓政党的次生型模式，即政党的产生是由于受到外界政治因素的刺激，是由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侵略引起的社会变化，被侵略国家的一些先进知识分子仿效西方国家政党方式而组织的。次生型政党是在经济发展比较落后国家的体制外产生的，依赖于政党领导这些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推翻旧政权，建立一个新的国家政权。中国的政党是在外力的强烈刺激下，先进的中国人在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过程中产生的。

第一节 政党思想的传播与政党组织的孕育

1840年的鸦片战争，震醒了沉睡中的中国人，一些有识之士，开始了“师夷之长技”。洋务运动的开展，产生了中国近代资产阶级，为中国政党的产生奠定了阶级基础。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使人们认识到了西方社会船坚炮利背后的政治因素，向西方学习的内涵，由器物层面上升到政治层面。随着“政党救国论”的提出与政党思想的传播，人们对政党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为政党的产生奠定了思想基础。而维新派成立的强学会等政治团体的出现，为政党的产生作了组织上的铺垫。

一、“师夷之长技”与中国资产阶级的产生

中国的封建社会经过长期发展，到了明代中叶，少数的手工业部门中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在清代，一些商人支配的生产行业已成为资

本主义萌芽的重要形式，但这种新的生产方式在自给性完整的封建社会经济结构中，其存在十分稀疏，成长也十分缓慢。

清朝的统治经过康乾盛世进入嘉道年间，长期积聚的各种矛盾严重激化，其统治由盛变衰，社会危机四伏。在清王朝统治由盛转衰的同时，遥远的西方此时是另一个景象。英国等西方列强已相继完成工业革命，确立了资本主义制度，并疯狂地向亚非地区各国，尤其是东方开拓商品市场和殖民地，企图将全世界都纳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体系。在这股大潮的冲击下，中国被迫打开长期闭锁的国门，被动地开启了现代化历程，传统政治文明的秩序也随之发生转变。

随着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侵略的加剧，以及中国与世界联系的扩大，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冲破“夷夏之防”的樊篱，以新的眼光审视世界。

龚自珍，曾长期在朝中任职，对清朝政治上的各种积弊有深刻的认识。他敏锐地认识到清王朝的政治腐败与国势衰败的根源在于专制体制，大声疾呼进行改革：“一祖之法无不敝，千夫之议无不韪，与其赠来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龚自珍的思想对后人的影响极大，梁启超曾评价说：“光绪年间所谓新学家，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

林则徐是一位思想深邃、具有实干精神的政治家。他在广州“日日使人刺探西事，翻译西书，又购其新闻纸”。1839年，他第一次用英文向外国商人发布中国政府的告示，并拟写了一封致英国女王的书信，亲自找洋人了解外国的情况，请其帮助修改致英国女王的书信。他在处理禁烟过程中所表现出的胆识、见解和勇气都是与传统思维模式和价值观念完全不同的。澳门的外国报纸这样评说林则徐：“中国官府，全不知外国之政事，又不询问考究，故至今中国仍不知西洋……骄傲自足，轻慢各种夷务，不加考究。惟林总督行事，全与相反。署中养有善译之人，又指点洋商、通事、领水二三十位，官府四处探听，按日呈递。”因此，林则徐能比他的同时代人更客观清醒地看待外国和自身，是“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魏源的思想比林则徐更深刻和系统，他编写的《海国图志》是第一部客观地系统介绍西方世界的著作。鸦片战争后，他提出了改革主张，大胆喊出了向西方学习的口号：“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这是第一个明确提出以西方为师口号，并把善不善于“师夷”当做能否制驭敌人的尺度。“善师四夷者，

能制四夷；不善师夷者，外夷制之”，表现出他向西方学习的清醒意识。

冯桂芬是林则徐的弟子。为躲避太平天国战乱，他逃到上海，在这个中西文明交汇、华洋杂处的通商口岸之地的见闻经历，使其眼界大开，他对西方世界和中国的认识比其同时代的大多数人来得清醒而客观深刻。1861年，他写成了《校邠庐抗议》一书，这部书得到了当时人们及后人的称道。他敏锐地意识到了中国所面临的巨大的危机：“中华且将为天下万国所鱼肉。”这种民族危机意识是难得可贵的，因为大多数中国人只是到了1895年甲午战争后才感到了国家面临瓜分危险的现实。

冯桂芬已经认识到中国的落后不仅仅是在魏源所揭示的“器”的层面。他第一次具体地提出内政、外交、军事、文化等全面改革的必要，指出封建主义的中国有“四不如夷”：“人无弃才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不符不如夷。”^①他已经看到了中国在整个制度层面的落后，而要“人无弃才”，须废“八股时文”。在政治方面，大胆提出要仿效西方“设议院”，采用西方的政治制度。他提出了“采西学”、“制洋器”的响亮口号，主张进行政治与行政改革。

郑观应也公开提出了要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尤其是议会：“欲张国势，莫要于得民心；欲得民心，莫要于通下情；欲通下情，莫要于设议院。”^②

王韬是那个时期少有的走出国门，亲自到西方世界体验的中国人。他去过处于英国人统治下的香港，曾远游西洋，并到了日本，其见识自然与众不同。他将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了专制君主制度：“我中国人民为四大洲最，乃独斯藐于强邻悍敌，则由上下之交不通，君民之分不亲。一人秉权于上，而百姓不得参议于下也。”^③

19世纪60年代，清政府内一些有见识的封建官僚，如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等人，接受了魏源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为寻出一条御侮、制内的“求强”、“自新”之路，开始学习西方“长技”，兴办近代军事工业，编练新式海陆军，掀起了颇有声势的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大体可以分为二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世纪60年代初到

①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0页。

②同上，第57页。

③王韬：《弢园尺牍》，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70页。

70年代初，中心是学习外国的军工制造及其科学技术。同治四年（1865年），李鸿章在上海开办了中国最早以机器进行生产的军工企业——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同年又在南京设立了金陵机器局。随后，左宗棠在福建设立了福州船政局。到了70年代，各地设立的以机器进行生产的企业已达20多个。

第二阶段，从70年代初到中法战争，其内容已从狭隘的军工制造扩展到工、矿、交通等社会经济生活领域，由“自强”向“求富”转换。李鸿章等在实践中认识到，军事工业需要完整的近代工交体系为基础，需要雄厚的经济基础，为此应当大力推广机器生产，大力发展工商业，“必先富而后能强”的思想成为共识。洋务派采取“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形式，开办了一些近代民用工业。丰厚的利润吸引了一部分官僚、地主、买办、商人，促使他们纷纷投资近代企业，民用工商业得到了发展。如同治十一年（1872年），开办了上海轮船招商局；光绪三年（1877年），在滦州开办了开平矿务局；同期在黑龙江漠河等地开办了金矿；1882年又开办了上海机器织布局。

据统计，从1869年到1894年的25年间，民族资本创办的近代企业有130余个，资本总额达500余万两，雇用工人3万人左右，中国资产阶级在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压迫的夹缝中艰难地产生出来。尽管中国资产阶级有种种弱点和缺陷，但它毕竟是中国社会经济结构中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代表。

由于中国资产阶级形成环境和生长基础的差异，中国资产阶级从一开始便形成了两个不同的部分。一部分是由大官僚、大地主、大买办、大商人转化而来的，他们构成了中国资产阶级的上层，亦即中国早期的官僚资产阶级。他们与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有较密切的联系，因而具有比较浓厚的买办性和封建性。另一部分是由手工业工场主和中小商人转化而来的，他们构成了中国资产阶级的中下层，亦即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他们处处受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的压迫和剥削，处境较为艰难，因而反对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政治要求较为强烈。但是，由于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状态下求生存，图发展，他们又不得不与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发生某些联系，因而在与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进行斗争时，又往往表现出妥协性和软弱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这种政治上的双重性格，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母体中铸造出来的，“是从娘胎里带来的毛病”。

中国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经济上尽管存在很大差异，但就发展资本主义而

言，他们又有一致的共同要求。这就决定了他们成为近代中国新崛起的政治势力——资产阶级政党的阶级基础。

在洋务运动中，培养新型人才及新式教育也开始起步，如开设了学习外国语言的学堂，大量翻译引进西方书籍。实际上早在道光二十二年，魏源就提出了“立译馆翻夷书”的建议；后来郑观应也主张“由西文译作中文，以西学化作中学”。这一时期还陆续设立了一些新式学校，如李鸿章“初在上海奏设外国学馆，奏设武备海陆军，又各立学堂，是为中国讲求兵学之始”。^①

此外，另一个对后来中国影响较大的举动是派遣学生出国留学。李鸿章与曾国藩曾合疏上奏朝廷，建议选派幼童送往美国就学。李鸿章说：“臣查选募出洋肄业西学，培养人才，实为中国自强根本。”^② 张之洞也主张：“宜令各省分遣学生出洋游学。”张之洞还向政府提出要允许国人自费留学，学成回国后能与“公派”同等对待，“如明旨许以出路，在外书院得有优等凭据者，可照等作为秀才、举人、进士，自备资斧者必多”。^③

随着西方书籍的翻译及新式学堂、留学生的出现，中国人的思想也逐渐发生了变化，对西方世界的认识也更加客观。

二、中西对比的反差与政治观念的更新

19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中国的政治制度依然是承袭了几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而在欧洲，大部分国家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成功，以主权在民、天赋人权观念为主要理论基础，以法律化、权力制衡为主要特征的资产阶级民主政体已经普遍建立起来。少数走出国门的中国人，亲眼看到了船坚炮利背后的另一个西方世界，看到了中西之间的政治制度方面的巨大差异，看到了西方先进科学技术背后的政治制度的巨大作用，悟出了西方强大的制度缘由。

1877年，清朝派出了第一个驻外使节郭嵩焘。作为中国驻英国公使，郭嵩焘亲眼目睹了西方社会的真实面貌，对西方社会进行了更多的理性思考。

^①陈学恂、田正平：《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留学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60页。

^②同上，第161页。

^③同上，第47页。

与同时代人相比，他对西方国家的认识并未停留在其表面的富强文明上，而是从开始赞叹西方民富国强的感性阶段过渡到认真探索西方富强的制度性原因。他对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如议会、政党等有了比前人更客观全面的了解，对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认识比其同时代人要高出一筹。与李鸿章等以为西方只是船坚炮利，只承认技术上先进的认识相比，郭嵩焘的思想更敏锐深刻。早在出使英国之前，他就认识到，西方富强的根本在于“朝廷政教”。他说：“窃谓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强，又末一节。”^①他还主张效法西方“强兵富国之术，尚学兴艺之方，与其通民情而立国本者也”。^②出使英国以后，他对西方富强的制度性因素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曾多次致函李鸿章，赞叹西方风俗政教之美：“此间政教风俗，气象日新，推求其立国本末，其始君与民争政，交相屠戮，大乱数十百年，蒸蒸日上，至今君主以贤明称，人心风俗，进而益善。”^③

郭嵩焘在担任驻英国公使期间多次到英国议会去旁听，他在日记中写道：西国均“设朝党野党，使各以所见相持争胜”，其中英国议会政党“一主时政，一专驳时政”，“两党之人平时相处甚好，对于国政却各持己见，辩论以人多为胜，败者亦遂敛然退听，无挟气以相难者”。^④据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郭嵩焘应当是向中国人介绍西方政党的第一人，也是第一个将“民权”一词写进中国文典的人。然而，郭嵩焘对西方文明的描绘却让当时的中国人无法接受，甚至他被视为“汉奸”。出使欧洲回国后，他一直未再受到朝廷的重用。1891年郭嵩焘去世后，清廷甚至颁旨：“郭嵩焘出使西洋，所著书籍，颇滋物议，所请着不准行。”

王韬也注意到了西方的政治制度问题，他在解释西方立宪制度的优点时指出，“苟得君主于上，民主于下，则上下之交固，君民之分亲矣。内可以无乱，外可以无侮。而国本犹如苞桑磐石焉。由此而扩充之，富强之效，亦无不基于此矣。”^⑤

①《郭嵩焘奏稿》，岳麓书社1983年版，第345页。

②同上，第348页。

③《郭嵩焘诗文集》，岳麓书社1984年版，第188页。

④《郭嵩焘日记》第3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89页。

⑤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四，光绪二十三年铅字本。

郑观应认为：“议院者，公议政事之院也，集众思广众益，用人行政，一至秉公，法诚良，意诚美矣。无议院，由君民之间多隔阂。……故欲藉公法以维大局，必先设议院以固民心。泰西各国咸设议院，朝野上下，同心同德”，正是这种政体，使西洋各国“合众志以成城，致治固有本也”。^①

黎庶昌将西方政党制与中国的朋党之祸进行了对比后评论：“西洋朋党最甚，无论何国，其各部大臣及议院绅士，皆显然判为两党，相习成风，进则俱进，退则俱退，而于国事无伤，与中国党祸绝异。”^②

1890年到1894年担任驻英、法、意、比四国公使的薛福成也说：“英国有公、保两党，公党退，则保党之魁起为宰相；保党退，则公党之魁起为宰相，两党互为进退，而国政张弛之道以成。然其人性情稍静，就其议论亦较持平，所以两党攻讦倾轧之风，尚不甚炽，而任事者亦稍能久于其位。”^③

薛福成看到了英国两党制与中国朋党的区别，看到了西方政党政治在协调社会、稳定社会秩序方面的重大作用。

需要注意的是，这些主张学习西方政治制度的思想家们，当时对于西方的“会”和政党政治，已经有所评介。他们指出，西方各行各业，均有“会”的建立。这种“会”的组织，对中国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马建忠对于西方议院制及其政党政治也有所谈及。他说：“美之监国，由民自举，似乎公而无私矣，乃每逢选举之时，贿赂公行，更一监国，则更一番人物，凡所官者，皆其党羽，欲望其治得乎？”^④他道出了美国议院中政党轮流执政的情形。

当然，这个时期人们对西方政党的认识是简单浅薄的，其见解一般局限于沟通君臣、稳定政治秩序等方面的作用，未认识到西方近代政党制度是与封建专制体制截然不同的政治制度，未认识到近代政党与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体制之间的关系。他们对于资产阶级的政党观念和政党制度的真谛，还处于朦胧状态。这些人基本上还处于从地主、官僚、买办向民族资产阶级转化的阶段，并且带有浓厚的封建主义意识，还没有真正完全反映出中国民族资产

①郑观应：《盛世危言》卷四，光绪二十一年刊本。

②黎庶昌：《西洋杂事》，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426页。

③薛福成：《出使英法意比四国日记》，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515页。

④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64页。

阶级的政治主张、观点和要求。因此，他们对于西方政治思想的传播，还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同时，这种认识和介绍也未引起更多中国人的关注，更无人将之作为学习效仿的对象。

总的来说，洋务运动时期的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客观真实地了解与传统的朋党完全不同的西方政党，也开始向中国人介绍与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密切相关的政党制度。当然此时他们所了解的知识十分有限，传播的范围也十分狭窄，绝大多数中国人也没有从中过多地获得近代政党制度的知识；但是，对于那时政治思想还相当保守闭塞的中国来说，确实起到了开风气、益民智的积极作用，为中国近代政党理论的形成、政党的产生打下了思想基础。

三、甲午战争的惨败与士人阶层的公开抗争

1894年发生的中日战争，以中国的惨败而告结束，这场战争实际上是新兴资本主义的日本与腐朽的封建专制的满清之间的战争。1894年8月，中日正式宣战，用西方现代武器武装起来的中国陆军惨败于日本军队之手。9月，中国陆军在平壤战役中失利，节节败退，日军占领朝鲜；10月，日军攻占旅顺、大连，占辽东半岛；北洋海军先在黄海大战中损失惨重，李鸿章为保持实力，令北洋舰队困守威海卫，不许出海作战，日军遂获得制海权，在山东半岛登陆，并随后攻占威海卫刘公岛，惨淡经营数十年的北洋舰队全军覆没，日军兵锋直逼北京。

1895年2月，在陆海军全面失败的形势下，清政府被迫派李鸿章为全权代表，与日本谈判。李鸿章代表清朝政府，全盘接受了日本提出的条件，与其签订了条件空前苛刻，损失空前巨大，对中国的主权领土完整损害极其严重的《马关条约》。

《马关条约》规定，中国向日本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澎湖列岛，赔偿日本军费二亿两白银，增添沙市、重庆、苏州、杭州等为通商口岸，允许日本商人在通商口岸投资设厂。

近30年的惨淡经营，耗费了无数的民脂民膏，建立了使用洋枪洋炮铁甲舰的中国海陆军，却被一个昨天还是封闭落后的、被视为倭寇的弹丸岛国打得大败。这样的结局令国人震惊、不解、深思，苛刻的停战条件更让中国人无法接受。

甲午战争的失败和《马关条约》的签定标志着近30年的以“自强”、